

# 我和刚刚复刊的《文艺报》

□ 郑伯农

“文革”中,《文艺报》被迫停刊。1978年5月底,中国文联在京召开全委扩大会,决定恢复《文艺报》。一个半月后,也就是7月15日,《文艺报》复刊号在京出版。当时,它仍是月刊,到1985年改为报纸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我被借调到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工作。研究室的总负责人是冯牧,复刊时的《文艺报》主编是冯牧、孔罗荪。两个单位不但是同一个领导,办公地点也紧挨着。研究室在东四礼士胡同路南,《文艺报》在路北,门对着门。大家信息互通、工作互补,关系十分密切。有一次两个单位共同组织秋游,大家一起观光、踏青,可谓其乐融融。

1978年5月初,我的老朋友李春光找我,说是文联筹备组通知他参加全委扩大会,要他在会上发个言。他说,他不熟悉文艺界的全局,要我帮他写篇发言稿。

我和李春光同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生,后来先后升入本科,在同一个系。毕业后,先后留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工作。“文革”中,在我最艰难的时候,李春光和其他一些同志冒着巨大政治风险保护、帮助过我。生死之交,难拒故人托。我马上答应下来,随即去找冯牧同志。我问他,你们要李春光发言,是要他就音乐界的问题讲点意见,还是让他在文艺全局问题上放个炮?冯牧莞尔一笑,说是后者。他这么一说,我心中有了数。当时,我和春光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,平日也经常交谈。我了解李春光胸中有什么不吐不快之语,也考虑有什么迫切问题需要年轻人出来呼啸呐喊,很快便写出稿子交给春光。这篇发言稿讲了几个问题:解放思想问题、艺术民主问题、团结问题。其中有一段话讲天安门诗歌,给它以崇高的评价,实际上是为正式平反制造舆论。这篇发言稿和茅公、周扬等老前辈的发言稿一起全文刊于《文艺报》复刊号上。

《文艺报》复刊不久,研究室理论组组长顾骥找我,说是文化部即将下文为晋剧《三上桃峰》平反,冯牧布置任务,要我就这部剧写一篇 文章,在《文艺报》刊出。顾骥交给我有 关《三上桃峰》的材料,我读了剧本和当年的大批判文章。这些材料过去大部分曾零星星地

看过。现在,被颠倒的历史终于要再颠倒过来了,我边读边感到一阵痛快。我执笔的这篇文章还牵涉到一个大问题——为“文艺黑线回潮”辩诬。邓小平同志复出后,大刀阔斧地搞整顿。在文艺领域恢复一些好作品的出版、放映、上演、展出权,并推出一些并非按“四人帮”帮规创作出来的新作品。江青等人对此十分恼火,诬其为“黑线回潮”,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此大加挞伐,掀起一股批判“黑线回潮”的逆流。我执笔的这篇文章从《三上桃峰》讲起,一直讲到所谓的“文艺黑线回潮”。不仅为一篇作品,也为整个的“黑线回潮”辩诬。可以说,批“黑线回潮”论,是批“文艺黑线专政”论的继续,它涉及“文革”后期的一些现行问题。这篇文章发表于《文艺报》1978年9月号,不久,其他媒体也发表了多篇为“回潮”作品辩诬的文章,形成较大的声势。

过去,文化部理论组的文章一般不署个人名字。到了为《三上桃峰》平反的这篇文章,冯牧为执笔者起了个笔名,叫“郑汶”。我猜想,它含有两层意思,一是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的文章,二是由姓郑的那个人执笔写的文章。郑汶这个名字古书上有,《三国演义》中有个人物就叫郑汶,是司马懿的部下。司马懿派他去诸葛亮那边假投降,为魏军作内应,不料一眼就被诸葛亮看穿了,推出去斩首。福建梨园界有一个说法:准如果倒了霉,就让他演一个被砍头的角色,在舞台上丧命之后,就会时来运转。我觉得这个名字蛮有意思,此后好几年,我的文章经常用“郑汶”署名。

这一年9月,冯牧派我到上海出差,搞调查研究。临行前,我到孔罗荪家里拜访这位老前辈。孔老是众所敬仰的资深文学理论家,我有许多问题要向他请教。还有一个很“实用”的目的,孔老长期在上海工作,担任《文艺报》主编后刚刚携家人迁京。他对上海的情况十分熟悉,简直是沪上文学界的一部活字典。老人家热情地接待我,给我指点迷津。他以个人名义亲笔为我写了三封介绍信,一封给上海文学编辑部的朋友,一封给上海《文汇报》文艺部,一封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。我按图索骥地采访《文汇报》时,文艺部的同志告诉我,复旦

# “我们环绕的是群山,面对的是高峰”

□ 吴泰昌

1955年,我从安徽当涂中学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。1964年,我从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,进入《文艺报》工作。在我读研究生的阶段,随时任《文艺报》特约评论员的师兄严家炎,一同去参加关于柳青长篇小说《创业史》的讨论会,当时负责主持《文艺报》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侯金镜也在场。会议上,我发表了关于柳青《创业史》与梁斌《红旗谱》之间人物形象比较的学术论文,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及文学期刊编辑的肯定。随后不久,中宣部决定在《文艺报》设立“文艺理论批评中心”,由周扬主持工作。著名文艺理论家、时任《文艺报》编辑部副主任的黄秋耘拿着中宣部的调令,到北大了解我的情况,决定让我到报社编辑部的理论组工作。私以为,此前的会议也许是我与《文艺报》结缘的偶然因素。

1973年,我从五千七千校借调到《河北文艺》杂志社工作。1976年1月,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复刊时我调去工作,至1978年7月《文艺报》复刊以后,我才又重新调回。这期间我经历过的领导、接触过的朋友都很多,有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周扬、叶圣陶、冰心、沈从文、钱锺书、曹禺、孙犁、严文井等文坛前辈,有张光年、冯牧、孔罗荪、唐因、唐达成等报社领导,还与杨晦、朱光潜、吴组缃、林庚、王瑶等北京大学的老师不失联系。

让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向作家孙犁的约稿过程。

叩问苍天,我很幸运,1995年9月初,我调到了《文艺报》文学评论部工作,此前我已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对于《文艺报》,我充满了深深的敬仰,这种心灵认知由来已久。对于《文艺报》的同事,我充满了深深的敬重,这是真情实感。

叩问内心,我很欣慰,调到《文艺报》是自我选择的一次完满,也是命运对于我的一次眷顾。有些人并不知道,北京以外的文艺界如何看待《文艺报》。在内蒙古作协理论研究室工作时,我身边的一些作家评论家,有这样的一个普遍共识:如果一个外省 的作家,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《文艺报》上没有发表过关于你的作品评论,那么你的创作水准仍然囿于本省;如果一个评论家,没有 在《文艺报》上评论过本省或外省的作家作品,那么他的艺术审美视野仍然没有走向全国。

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。我到精英荟萃的《文艺报》上班,心中怀有一种深切的敬重。在吴泰昌老师的领导下,在文学部同志们的帮助下,我比较快地进入了编辑角色,同时参与了冰心老人题词的《儿童文学评论》专版的编辑工作。业余时间,我为孩子们写作,为了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快乐成长的绿色环境,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。在《文艺报》的这个岗位上,我了解了新时期以来全国文学创作的概貌,了解了儿童文学界的创作态势,相继结识了不同年龄阶段、不同审美追求、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,以及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文学新人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遇,给了我心灵很多美的滋养,使我眼界大开。在我的眼前,展现出了一个文学艺术万紫千红的世界,一个美丽的时光花园。调到《文艺报》,我像一条小溪流入大海,似乎失去了小我,然而获

得了大我。调到《文艺报》,对于我的人生来说,是一个重要的驿站,一个审美再出发的故乡。在儿童文学评论的编辑工作中,在文艺报社内外的有关会议中,在电话组稿和骑车约稿的过程中,我学习大家泰戈尔,做一个有心人。有了一点一滴的心灵感知,有了一鳞半爪的审美发现,我都会随时随地记录下来。

我2002年底离开《文艺报》,调到中国作协机关。离开《文艺报》前,总编室是我最后的一个工作岗位。也许是肩负重任,也许是心有灵犀,一到总编室工作时,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——要把付印之前各部门的校样认真通读一遍。

我是这样想的,也是这样做的,当时的真实心态是:第一,通读校样,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,因为我渴望拓展艺术视野,丰富心灵美感,提升自我境界;第二,通读校样,如果能把版面上存在的错别字一个 一个找出来,交给责编订正之后,再请分管领导过目,就可以把好报纸付印之前的最后一关,我心里会感到踏实;第三,通读校样,总编室和报社各部门之间可以加强沟通,增加协作,达成一片和谐。那时候,个人的电脑普及率很低,绝大多数作者的文章,都是在报社的打印室里敲出来的。鉴于此,通读校样,必须全神贯注,一丝不苟。

记得那时候,我住在海淀区清华大学南门附近,骑自行车到报社要用1小时45分钟,两地之间是程马拉松的长度。夕阳西下,下班回到家,我已经骑自行车完成了一天一个马拉松的历练。这样骑车奔波,一年下来就是一个万里长征。虽然感觉身体疲惫、双腿僵硬,但是目光清新如月,心灵舒畅如泉。

记得那时候,因为经济效益问题,《文艺报》曾和有

大学学生卢新华写了篇小说,叫《伤痕》,在校园里引起轰动。8月间,《文汇报》全文刊发这篇小说,在更大的范围引起热议。回京后,我把这个信息向冯牧、孔罗荪汇报。不久,《文艺报》专门为《伤痕》召开了新作研讨会。

我到上海的第二天,冯牧的电话追到旅社来。他要我快速返京,赶写一篇文章,具体情况见面再说。我回京见到冯牧,他说,你放下别的事,马上赶写一篇为天安门诗歌平反的文章。他还向我透露了一些信息,由于必须遵守纪律,他没有讲得很详细,但我能意会到,党中央不久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。听了冯牧一席话,我十分欣喜。与其说我是因为接受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写作任务而欣喜,不如说我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望而欣喜。依我的拙见,天安门诗歌不但有重大政治意义,也有强大感情冲击力,也就是诗感染力。没有人号召,没有人部署,骤然间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诗歌运动,直接推动了历史的转折,也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。这是中国文艺史上的奇迹,也是人类文艺史上的奇迹。我大约在9月底或10月初写好稿子,《文艺报》审阅后拿去排字,等待发表时期。11月14日,应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邀请,上海《于无声处》剧组进京演出。11月18日,经党中央批准,中共北京市委做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。12月15日,《文艺报》刊出署名郑汶和童怀周的两篇文章,为天安门诗歌平反。我很敬佩童怀周,这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十几位同志的共同笔名,他们收集保存革命诗歌,编辑出版《天安门诗抄》,为此付出千辛万苦,历经千难万险。他们的劳作功在千秋,应当为历史所铭记。

1978年之后,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和《文艺报》继续保持密切联系,我为《文艺报》供稿,得到他们的许多帮助。直到1984年中宣部召开京西宾馆会议,特别是年底中国作协召开第四次作代会之后,我给《文艺报》提供的稿件大大减少了,但和报社的许多同志仍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。真没有想到,1989年底,我被派往中国作家协会任职,居然荣幸地成为了《文艺报》的一名正式员工。

风风雨雨,既有坦途和收获,也有坎坷与曲折。在报社工作,面对由于历史原因、现实原因造成的复杂状况,要采取一种比较超然、公平的态度,更要尊敬每一个对文学事业做出贡献的人。

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,也是我曾经挥洒汗水、奉献青春的工作单位《文艺报》70岁生日,我作为报社的“老兵”,对《文艺报》充满了感恩之情。在这里,我得到了很多教育,了解了很多文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。《文艺报》的历史不知是报社,也相当于新中国文艺史、文艺运动的缩影。多年来,《文艺报》尽力呈现出当代中国文学本身的多样性,不断鼓励对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有着不同的主张、看法的人们,为他们搭建平台,希望通过争鸣、对话和交流,来实现文艺事业 的进步与发展。毫不夸张地说,《文艺报》是新中国建立以来,全国范围内成立最早、影响最大的文艺类报纸。

现在国家已经进入 了新时代,在文艺建设方面也有着很多新的战略和规划。我们环绕的是群山,面对的是高峰,要勇于攀登高峰。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,我希望现在的《文艺报》能够有新作为,既要继承传统,又要根据现实情况寻找自己发展的角度,争取办成特色鲜明、影响广泛,对文艺发展具有引领性、导向性的媒体。

关方面合作,出版相关增刊。因为增刊的出版,有时一天下来,我要通读10多块版的校样,文字量超过10万字。通读校样的时候,由于精神高度集中,毫不松懈,我会感到头脑发胀,眼睛酸涩。倘若在版面上发现了一个错别字,就像在海滩上捡到一颗珍珠。倘若在一个版面上没有发现一处需要删剔的字词——尽管这样的情况很少遇见,我会非常欣慰。

毋庸置疑,人一退休,就是生理年龄层面上的人到老年,这是顺其自然的人生夕阳时段。因为有了为孩子们写作的心灵体验,有了孩子们的爱相伴,我不会孤独。因为有了在《文艺报》编辑儿童文学评论的经历,有童心相随,我不会寂寞。人到老年,在回归童年,在攫获童心的岁月流光之中,我做了一个自以为颇有诗意的选择——带小孙子,这使我有 了钻石一样的收获,撰写了关于小孙子成长的作品,《小孙子是我的天堂》和《孩子是自己的上帝》。倘若没有 在《文艺报》日复一日的磨砺、年复一年的润泽,我恐怕写不出令自己心灵震撼的作品。《文艺报》给了我很多滋养,很多恩泽,使我铭刻在心,终生受益。对《文艺报》,我怀有一种深深的敬重,深深的感佩,深深的珍重。这两部作品,深切地表达了我对无常世界的一腔敬重,深情地撰写了我对孩子们日新月异成长的满腔挚爱,也是我呈献给《文艺报》的一份心灵检视报告。

《文艺报》与共和国同龄,她是文学艺术界的一面光辉旗帜,70年来面对峥嵘岁月的如磐风雨,她立场坚定,旗帜鲜明,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,肩并肩手拉手,和着时代的脚步前行。在她70年的历史征程中,她大海一样广阔的文化情怀,蕴含着不可比拟的时代脉动,与伟大的民族复兴紧紧相连;她大地一样深厚的核心价值,包含着共和国诞生前一代代人的执著奋斗,闪烁着一朵朵生命浪花的美丽晶莹。

爱与美的艺术品格在《文艺报》熠熠闪光,她像时光花园一样美丽,盛放着一朵朵五彩斑斓的艺术之花,展现着一个个流光溢彩的春天画卷。

1956年底,我进入文艺报社工作,到1982年调往《小说选刊》为止,整整27年。记得我刚刚到报社的时候,谢永旺在迎新会上说:“当我离开人世的时候,我要像别林斯基一样,将我的《现代人》和《祖国纪事》——《文艺报》枕进棺材”,这句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。

《文艺报》通常是政治斗争的突破口,经历几番风雨过后,1956年,张光年、侯金镜临危受命到《文艺报》履职。1958年1月出版的《文艺报》第2期上刊出《再批判》特辑,按语是毛主席改写的,来信中点名批评张光年等3位正副主编“你们政治不足”,“你们是文学家,文也不足”。张光年极度兴奋,继而紧张,说:“我们《文艺报》说空话、发空论的文章不少,洋八股、党八股积重难返;我肚子里的货色少,写出来的文章空,一片衷忱,满纸呆相。”他坐不住了,撰写出《论说托尔斯泰没得用?》《端方的下梢头》等不少生动活泼的文章,对我们改造文风影响非常之大。他温文尔雅的诗人气质、谆谆教诲的学者风度、热情洋溢的演说才能以及刚劲秀美的书法艺术,都是那么清晰和美好,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。

黄秋耘洋溢着艺术情调的批评文字别具一格,他喜欢“精致而优美的艺术形式”,“宁愿沐浴在小小的浪花中洗净自己的心灵”,不愿“时时刻刻都在装腔作势地咆哮”。他的作品如《杜子美还家》《丁香花下》《雾失楼台》等,成为他人道主义理念的文学范本。

资深的领导兼评论家冯牧,任《文艺报》的专职评论员。他热情奔放,敏感有才,人缘最好,来客最多,团结作家、阅读作品最多,是推荐作品最勤、最热情的文艺批评家,一直到老,仍手不释卷。冯牧精通中外、思想开放,其文学评论人所称道。上世纪80年代参加作品讨论会,我亲眼冯牧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地引用原著,联想起在《文艺报》的日子,几乎掉下泪水。

张光年文质彬彬,侯金镜凝重严谨,冯牧敏感热情,黄秋耘简约精当、脉脉含情,是他们把我们一伙年轻编辑带大的,我们恭恭敬敬地称他们为老师。

在从事文学编辑和文学评论方面,《文艺报》是我的摇篮,侯金镜是我的恩师。他嘱咐我说:“你自己有了写作实践,方知评论的甘苦,约稿时就有了共同语言。”“我要让你的专业相对地固定下来,长期不变,争取在这一领域有自己的发言权。”

侯金镜手把手教一个出身不好的人熟悉业务。他教我一丝不苟,更要我“有胆有识”。他敢于顶风,为收有萧萧的《三月雪》、杜鹏程的《年轻的朋友》、陆文夫的《小巷深处》、王蒙的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的《1956年短篇小说选集》撰写序言,序言的题目是《激情和艺术特色》,序言中说:“不能充分保证他们的个性和想象力在宽阔而自由地发展,公式化、概念化的堡垒也不能最后地、彻底地被冲垮。”到了三年困难时期,文坛仍处在反右倾、一步步走进死胡同的当口,侯金镜发表《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——读茹志鹃小说有感》,文中写道:“高亢激昂、豪迈奔放的革命英雄主义是我们这时代的主调”,但是“茹志鹃作品的优美柔和的抒情调子,唤起了读者对于时代的温暖、幸福、喜悦的感情,这种感情既是健康的,也反映了人们多样化的感情生活的一方面”。在当时那样狂热的人文气氛中敢于这样开明地衡文论道,实属空谷足音。

1961年底,侯金镜带我到颐和园云松阁阅读全年的中、长篇小说,教我分析作品的思想和艺术。只要言及鲁迅和苏俄文学,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,对托尔斯泰、果戈里、别林斯基如数家珍。我发现在他的文艺思想里有一条十分明晰的红线,就是现实主义——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和干预生活的批判现实主义。

侯金镜一有发现,便到我的窗外喊上一声,《红岩》就是他首先喊出来的。他说:“现在是困难时期,人们物质生活匮乏,要使大家的精神生活丰富起来。”“我们需要革命的浪漫主义,但要拿生活的真实作基础,绝不能拔高人物。当前形势下,宁肯牺牲浪漫主义,也不能牺牲现实主义!”在侯金镜的鼓励下,我写了《一九六一年中、长篇小说印象记》,重点推出《红岩》。他又组织了一次讨论会,共5人:王朝闻、孔罗荪、王子野、李希凡、侯金镜,由我记录整理,题为《〈红岩〉五人谈》,一时间,全国掀起“《红岩》热”,1962年被称为“《红岩》年”。

侯金镜反复强调“有胆有识”,极力避免“胶柱鼓瑟”。“文似看山不喜平”,还要有曲直和张弛,不能“一道汤”。侯金镜提醒我,分析一部作品时,一定要抓住人物的个性特征。他说,你精细地分析一个鼻子,但要看清它长在什么人的脸上,而人又是历史的,是 社会关系的总合。侯金镜的“鼻子”说,让我久记不忘。

侯金镜厚积薄发、诲人不倦的作风、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、严谨周密的卓识锐见,凡三昧,颇得其终生为之追慕的鲁迅遗风和神韵。1969年9月部分作协会员下放干校。侯金镜的最爱是书,十多架书橱,送的送、卖的卖,唯有鲁迅的著作以及研究鲁迅的书籍一本没动、一页不丢,连同他认为最经典的马列著作一起,全部打包装箱运往湖北咸宁向湖湖畔。收工之后,他把马灯拨亮,坐在马扎上,俯身床边学习《鲁迅选集》,直到深夜。

历尽劫难,《文艺报》先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1978年7月复刊,抖擞精神,敢为人先,代表被“文艺黑线专政”论折磨得九死一生的文艺家们向着真正的“文艺黑线”发起猛攻。“天安门诗抄”的大松绑,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的大解放,真理标准和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大讨论,为作家作品平反,为《班主任》等“伤痕文学”开路。一面是同病相怜,一面是同仇敌忾;一面是推倒文化专制,一面是张扬文艺复兴;一面背负传统的包袱重整归部,一面打开因袭的闸门扩充新军;一面是思想的解放,一面是忘我的工作。在东四南大街礼士胡同52号的一座小院内,聚集着义愤填膺的编辑和记者,冯牧和孔罗荪尊重他们,放手让他们工作。《文艺报》是一台灵敏度极高的收发报机,没有辜负两个月前文联全委会“开创文艺新时期”的殷切嘱托。

当时的编辑部人员不多但工作效率极高。大家挤在一个大房间里,热气腾腾,不知疲倦地议论,不遗余力地编写,那份上进、那份融洽,在《文艺报》的历史上绝无仅有。它既是敢于弄潮的参谋部,又是对外开放的文艺沙龙,不少中青年批评家来这儿做客,聊着聊着一篇文章就有了。我们的主编冯牧,同时领导着文化部理论政策研究室,江晓天、顾骥、刘梦溪、郑伯农、李兴叶等一批帮杆子像一家人一样经常走动,言必“思想解放”,语多“文坛动向”,激昂慷慨,捶胸顿足。我们为恢复革命的现实主义呐喊请缨,为迎接“伤痕文学”,惊呼短篇小说的新气象、新突破和中篇小说的新崛起,甚至理直气壮地为冤屈如山的作家和作品平反,其势如地火之奔突、狂飙之卷席,蔽翦春意遍于华林。

我们举办了好几期“读书班”,联系和扶持一批文学评论新作者如黄毓璜、童庆炳、刘思谦、吴宗惠、肖云儒、谢望新、李星等,又把“文革”前写评论,现在考虑要不要继续写作的中年评论家如单复、王愚、潘旭澜、宋遂良等邀请来京,授命撰写重头文章。这年评论力量为新时代的创作开路,披荆斩棘,蔚为大国。我和谢望新不约而同地把“读书班”誉其名为《“文艺报”的黄埔军校》,直至今日,大家谈论起来仍然激动不已,“你是‘黄埔’N期的吧?”“永远忘不了咱们的‘黄埔’!”

我的编辑生涯大部分是在《文艺报》度过的,“文革”前后总共27年,我与《文艺报》命运连,一损俱损,一荣俱荣,《文艺报》是我安身立命的摇篮。

□ 阎纲

# 二十七年是与非



原发《文艺报》1962年第2期